

為要尋一顆明星

新近發現徐志摩致奧格登書信探析

劉洪濤 ◎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
劍橋大學訪問學者

◆ 徐志摩親筆英文信發現始末

中國現代詩人徐志摩（1897-1931）曾於 1921 至 22 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，期間曾與許多英國著名作家、學者交往，有些還建立了深厚友誼，其中包括奧格登（Charles Kay Ogden, 1889-1957）。香港學者梁錫華編譯的《徐志摩英文書信集》（聯經）出版於 1979 年，為徐志摩在劍橋與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、弗萊（Roger Fry）、魏雷（Arthur Waley）等人的交遊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但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，此書並未收錄徐志摩給奧格登的書信。奧格登一向有收藏書籍、保存文件的習慣，一生有大量積累。他於 1957 年去世後，遺產為弟弟弗蘭克（Frank Ogden）繼承。弗蘭克不久就把奧格登的十萬冊藏書售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，但留下了奧格登的文件，因為他發現這些文件中包括有其與作家喬伊斯、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等眾多名人的通信，是相當珍貴的文獻紀錄。弗蘭克不久在同年去世，奧格登的大部分文件又輾轉到了正語學會（Orthological Institute）——這是奧格登在 1927 年創辦、旨在推廣「基本英語」（Basic English）運動的一個組織，由他的朋友兼律師海曼（Mark Haymon）負責管理。1980 至 81 年間，正語學會委託英國克魯魯鎮的拍賣公司勞倫斯（Lawrence of Crewkerne）將這些文件的絕大部分拍賣，加拿大麥馬士打大學（McMaster University）購買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，包括徐志摩寫給奧的書信在內，其餘則被英國倫敦大學、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等買下。徐志摩的書信就這樣來到了麥馬士打大學，與奧格登的其他文件一起，保存在大學圖書館的威廉·雷迪檔案與研究資料庫（The 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）。圖書館還特別建立了奧格登檔案（C. K. Ogden Archive），並將這些書信歸入三十號箱。

◆ 書信內容從未披露

徐志摩的這六封信件寫於 1921 至 24 年之間，或長或短，其中一封為明信片。在奧格登檔案中，關於這些信件的发信人紀錄是 HSU, TSIMON 和 HSU, C. H.，其實都是徐志摩，因為那個時代的英語拼音十分混亂，所以他的名字有不同拼法，且不只這兩種，其他常用的還有 Tsu-mo Hsu 和 Tseu-mou Hsu 等。HSU, C. H. 中的 H 是 Hamilton 的縮寫，這是徐志摩給自己起的英文名字。梁錫華在 1979 年之前從麥馬士打大學圖書館查閱到徐志摩給羅素的書信，卻與該校在 1980 至 81 年間購入的奧格登檔案失之交臂，這使得徐志摩給奧的這六封英文書信並未收入《徐志摩英文



書信集》中，而在那裡靜靜地躺了二十四年。最近，筆者發現了這些信件，並對其中線索仔細梳理，才讓徐志摩與奧格登的密切關係得以呈現，以及重塑徐志摩當年在劍橋活動及其後返國的一些生活內容。

◆ 留學劍橋——初會奧格登

奧格登是著名語言學家，他在190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劍橋大學麥格達倫學院（Magdalene College），年十九歲。他在求學時期已經有很大的名氣，是劍橋一個重要的學術、思想組織邪學社（Heretics Society，梁錫華譯作「邪學會」，創立於1909年）的創始人之一，並長期擔任主席。他在191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；畢業後留在劍橋，一邊開書店，一邊從事學術活動。他在1912年創辦《劍橋雜誌》（*Cambridge Magazine*）—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這份雜誌成爲一個有關政治和戰爭的國際論壇，引起廣泛注意。他後來把精力集中在編輯出版學術著作以及語言學研究上。他將其語言學研究成果應用實踐，從而創立了「基本英語」，這便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於全世界掀起的「基本英語」運動的根源。

徐志摩在1918年赴美國留學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政治，1920年9月獲哥大頒授碩士學位，旋即轉赴英國。他到英國後，先入讀倫敦經濟學院（London College of Economic）。1921年春，經英國學者狄更斯（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）介紹，才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（King's College）作研究生。1922年8月17日，徐志摩離開劍橋大學到倫敦，9月離開歐洲，10月回到上海。算起來，他在劍橋的學習約有一年半時間。徐志摩與奧格登相識，大約在1921年7月間，那時他住在劍橋南郊六英里的沙士頓（Sawston）。徐志摩給奧的頭兩封信分別寫於1921年7月12日和18日。他在第一封信告訴奧，自己因為要去倫敦，所以無法與他在星期二見面，希望把見面的時間推遲一個星期。從這封信的語氣推斷，徐志摩是初次約見奧格登。六天後，徐志摩寫了第二封信，他們顯然在此期間已見過面。徐志摩告訴奧格登，有兩位張姓同胞（其中一人可能是張君勳）也想見他，希望他能到沙士頓來會面。徐志摩在劍橋期間與奧格登成爲摯交，但遺憾的是，這期間沒有書信留下來。徐志摩1922年9月離開歐洲、啓程回國。在回國的第一時間（約10至11月間），他就給奧寄了一張明信片，報告自己歸途順利，只是天氣太熱。並請奧寄來一本藝評家弗萊在1920年出版的著作《視覺與設計》（*Vision and Design*）。這表明了兩人交往密切。

◆ 向中國介紹西方語言學

1923年5月10日，徐志摩又給奧格登寫信。在這封信中，徐志摩要求奧寄來一本奧和理查茲（Ivor Armstrong Richards）合著，1923年出版的《意義之意義》（*The Meaning of Meaning*）。他還告訴奧，已經把奧的信（可知此前奧格登應曾給徐寫信）在兩份大報上發表，並且就奧在信中所討論的問題徵求了一些中國學者的意見。遺憾的是，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還不知道奧格登給徐的有關信件發表在什麼報刊上，也不知道信的具體內容。但根據現有資

料，可以推測是涉及奧格登這一時期正在進行的「語言之魔力」（the power of Word Magic）的研究。至於《意義之意義》這本艱澀的著作，是應用二十世紀初期心理學、語言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，深入探討語言的歧義現象、語言與思想的關係、對語言的控制和利用等。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此書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。此外，此書可說是奧格登和理查茲後來一系列學術發展的起源。但是在當時的中國，現代語言學研究才剛剛起步。因此，徐志摩告訴奧，奧在中國將很難找到知音：「我只見到極少數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且有專門研究的學者，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，我發現他們的意見並不中肯，和你的觀點也不相近。」徐志摩在信中說，他在去年聖誕節時給奧寄去一本胡適論邏輯的書（即胡適192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*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*，中譯本《先秦名學史》在1983年出版），希望奧能透過這本書有所得。

◆ 為出版梁啟超英文著作穿針引線

徐志摩在1921年11月7日曾給羅素寫信（見《徐志摩英文書信集》），就《心理學、哲學與科學方法國際文庫》（*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,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*，以下簡稱《國際文庫》）擬出版一本介紹中國哲學的書之事宜，與羅討論作者人選問題。徐志摩在1923年5月10日和同年11月15日給奧格登的信，也涉及到由奧擔任學術編輯、羅素擔任學術顧問的這套系列叢書。

《國際文庫》的主旨是介紹世界各民族最優秀的哲學思想，當然也包括中國。羅素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曾訪問中國，故很了解中國學術界情況，他推薦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（上卷由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出版）給《國際文庫》，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。但徐志摩在上述給羅的信中認為，胡適的這本書並不適合翻譯出版，理由是這部著作只寫出了上卷，其中又包括大量西方讀者不感興趣的枯燥考據，篇幅又長，加上胡適太忙，恐怕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。這些理由十分充分。徐志摩繼而建議他們邀請梁啟超出版一本「有關中國思想的書」。他在信中介紹梁是「中國最淵博學者中之一，也很可能是文筆最雄健流暢的作家。他在解放中國思想，以及介紹普及西學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，值得我們萬分欽仰。他在學問上吸收與區別的能力是別人永不能望其項背的」。

羅素對梁並不陌生。梁啟超1920年4月發起創辦的「講學社」是邀請羅到中國講學的主要團體之一。羅素在中國期間，與梁多有交往，並對梁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羅素和奧格登當即接受了徐的建議。梁啟超也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，這後來促成了他的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（商務印書館，1923年）一書的出版。

梁啟超完成的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與羅素、奧格登要求的「中國思想」在涵蓋範圍上有一定出入，徐志摩在1923年5月10日給奧的信中對此的解釋是：「這和思想通史大致是一碼事」。梁啟超完成的是中文本，翻譯成英語的任務最初由徐志摩負責。徐志摩的翻譯工作開始於1923年4、5月間。他在上述給奧的信中說：「到目前為止，我只翻譯了導言。書的篇幅



很長，翻譯成英文，我想不會少於三五〇頁。如果我下決心幹，估計需要整整一個夏天。不管怎樣，我個人認為此書是來自東方的重要貢獻，我願意花幾個月時間來翻譯它。」徐志摩顯然十分認真地看待此事，他甚至準備把部分譯文寄給英國漢學家翟理斯（Herbert Allen Giles）和魏雷，要聽取他們的意見。但徐志摩後來太忙，不得不放棄翻譯工作，這在他於 1923 年 11 月 15 日給奧的信中得到證實，他說：「至於梁先生的書，我真是慚愧極了，一方面對不起你，另一方面也對不起梁先生。我不是不願意承擔這一翻譯工作，但這意味我要花連續三個月時間全身心投入，這是我沒法辦到的。同時，西伯利亞的秩序已經恢復，我現在正計劃再去一次歐洲旅行。我很快還會再給你寫信。」徐志摩推辭這翻譯任務後，此書改由《世界通解叢書》（*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ries*）的一位編輯 L. T. Chen 接手完成翻譯。最後，梁啟超的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英譯本 *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: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* 終於列入《國際文庫》，由英國倫敦的基根出版社（Kegan Paul, Trench, Trubner & Co.）在 1930 年出版。

然而，羅素和奧格登並沒有放棄請胡適寫一本類似著作的打算。由於梁啟超提供的是一部斷代政治思想史，故寫一本全面介紹中國思想的書之任務就落在胡適頭上。徐志摩在 1923 年 11 月 15 日給奧的信對胡接受這個建議抱有信心：「胡適博士幾天內就會來北京。我可以有把握地說，他對自己的書在英國出版一定很高興。我見到他後會再寫信給你。」他在 1924 年 2 月 11 日的信中告訴奧，胡已接受了在英國出版他的著作的建議：「胡適先生很高興你打算在英國出版他的書。我相信他不久就會給你寄去他的改定稿。或許他已經寫信給你了。」事實上，胡適並未寫信給奧，奧格登檔案中也沒有收藏胡適這部「修訂稿」。可能是胡適根本並未寄出稿子。但奧格登當時顯然一直在等，我們從 1930 年《國際文庫》叢書扉頁上預告的書目中，還可以看到胡適的《中國思想發展史》（*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*）。遺憾的是，羅素和奧格登所期許的這部著作，始終沒有面世。

延伸閱讀

劉洪濤著，徐志摩與劍橋大學。臺北市：秀威，2007年2月。